

宋振全, 宋 扬, 于云荣, 等. 市场经济视域下农业供给侧改革: 历史镜鉴、生成逻辑与困境破解[J]. 江苏农业科学, 2017, 45(19): 14-17.
doi:10.15889/j.issn.1002-1302.2017.19.004

市场经济视域下农业供给侧改革: 历史镜鉴、生成逻辑与困境破解

宋振全¹, 宋 扬², 于云荣¹, 王洪秀¹

(1. 廊坊师范学院, 河北廊坊 065000; 2.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 100081)

摘要: 当前我国农业发展的突出问题是粮食生产的成本高、效益低、价格缺乏国际竞争力, 农产品供需结构性失衡, 农业资源环境约束日益趋紧, 粮食安全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 都离不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历史镜鉴: 农村计划经济时期的供求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国家利益放在首位没有问题, 但是也不能漠视农民意愿这个最大的实际; 生成逻辑: 农村供给侧改革是市场经济下总需求理论出现缺陷而作出的新调整, 农村供给侧改革是对中国农村实际的应然回应; 困境破解: 推进农村供给侧改革, 体现各色市场不同的要求; 产品供给——绿色; 地区供给——特色; 制度供给——共有。

关键词: 市场经济; 农业供给侧改革; 历史镜鉴; 生成逻辑; 困境破解

中图分类号: F320.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1302(2017)19-0014-04

经过多年努力发展, 我国农村农业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农业的主要矛盾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 突出表现为阶段性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存, 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1]。2015 年 12 月底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首次强调要着力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6 年初的中央一号文件更是开篇就明确提出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前我国农业发展的突出问题是我国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的成本高、效益低、价格缺乏国际竞争力, 农产品供需结构性失衡, 农业资源环境约束日益趋紧, 粮食安全问题, 我们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要确保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上, 解决这些问题, 都离不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 使农产品契合消费者需要, 真正形成有效供给, 对于实现农业现代化和提升农民的生活质量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农村计划经济供求之殇

1.1 农村计划经济时期供给和需求

1949 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之后, 中国进入了全面的制度和体制创新时期。1949—1952 年, 中国政府在积极创建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的努力中, 奠定了计划经济的雏形,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国民经济残破混乱的局面, 按照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 努力构建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 确立了国营经济(没收官僚资本和根据地的公营经济组成的)的领导地位。在农村中, 这段时间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 土地改革基本完成, 彻底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 满足了亿万农民对自己拥有土地的要求, 与此相对应, 在经济管理方面实现了“大计划小市场”的混合管理模式, 也可以称为“半计划半

市场的经济体制”, 充分发挥了新中国在政治环境、劳动力资源、国内市场等方面的比较优势, 这种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加强政府计划管理的经济运行机制, 供给和需求基本平衡, 因此, 当时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2]。在前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和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影响下, 我国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 为了快速改变中国落后贫穷的面貌, 1952 年, 在国民经济恢复后, 中国领导人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发展战略^[3], 为了推行此发展战略, 国家采取了以计划配置资源的方式, 至此形成了以全面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为内容的宏观政策。中共中央决定从 1953 年 12 月正式对粮食、植物油等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 这一制度的执行, 不可避免地造成国家与 1 亿多个个体农户的摩擦和冲突, 国家因此要支付高昂的交易成本^[4], 而要降低成本, 途径就是农业集体化, 从 1953 年到 1956 年底, 全国 96.3% 的农户加入了生产合作社, 农业合作化任务提前完成, 在供给与需求关系上, 要求国家对农业社粮食的统购统销数量, 以社为单位, 分社核定, 统一计算, 对社员粮食的分配, 必须保证完成国家核定的粮食征购任务。对主要工农产品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 随着时间的推移, 国家对生产资料统一分配的种类和范围迅速增加, 包括植物油、棉花和粮食在内的部分消费品实行计划分配, 1955 年 8 月, 在粮食供应方面, 规定了居民每月口粮的定量标准, 并发送粮票来保证严格执行。

1.2 农村计划经济供求优劣带给我们的启示

农村这种供给方式, 与我国建国初期落后的生产力有关系, 但是最根本的还是我国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结果。新中国成立前后,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现代化的思路是非常清晰的, 即大力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在完成基本积累后再转入重工业, 并达成了共识。但是朝鲜战争的爆发让中共领导人的看法开始发生变化, 深层的原因则是中国近代屈辱史激起共产党人“求强预御侮”的思想, 落后就要挨打的危机意识非常强烈, 再加上当时的国际严峻形势, 对中国形成了包围圈, 于此放弃了最初曾经首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想法, 不得不选

收稿日期: 2017-06-12

基金项目: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编号: HB17MK024)。

作者简介: 宋振全(1965—), 男, 河北廊坊人, 副教授, 主要从事法学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E-mail: 1097857860@qq.com。

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方针,这一战略的确立,内涵着“安全第一”的价值取向,反映了人们自遭遇重大损失和牺牲之后愿意承担高成本的改进措施,也反映了毛泽东的“大仁政”,即民众的长远利益和国家的整体利益要高于民众当前的消费需要,所以消费品短缺,供给总量不足就是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自然结果了。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工业化建设更多的是从军事、政治战略上,而不是主要从经济发展的需要上来考虑和谋划,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是无可辩驳的。但是,这种供给方式(农产品低价政策)压抑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也降低了他们向国家出售产品的积极性,为了保障发展重工业的原料供应,就必须对农产品进行统制,为了进行统制就必须做出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安排,而这种制度安排又产生了严重的供求缺口,导致农产品的严重短缺,国家粮食计划在许多地方不能按期完成,形成购销严重不平衡。1958 年的“大跃进”运动加速发展重工业,与此相适应,为了获取更多的原料,在农村实行了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 年爆发了一场大危机,供给和需求关系崩溃,非正常死亡者数以万计,农村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破坏。如果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从国家安全视角考虑的话是没有问题的,但实际上赶超型发展战略的推行,造成了中国产业结构的极大扭曲^[5],这种未能充分发挥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并有效规避资金缺乏的比较劣势的资源配置造成了 2 个后果,一是制造业比例太高,二是服务业比例偏低,这种结构背离了中国资源的优势,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严重影响了消费品总供给的增长,农产品总供给不足,日用品和消费品严重短缺,给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提高带来了严重障碍和恶劣影响。计划经济的实效来源于社会成员对信息的完全掌控和劳动者对劳动不计报酬仍然有极高的热情,而这 2 点都是不符合逻辑和事实的,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劳动者的思想道德水平还没有达到进行几乎义务劳动又心情愉悦、干劲十足的程度,所以必然产生由于缺乏竞争和激励不足而导致的效率极其低下。农村计划经济时期的供给失衡给我们的启示是:任何时候,经济发展都要受国家大战略(安全)的统领,国家利益高于短期经济利益,在极其严重的形势下甚至可以牺牲人民的当前利益;在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前提下,经济发展要遵循经济规律,所有制或者说所有制的实现形式要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我国没有经历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其中中性的东西,诸如发展商品经济、市场调配资源的方式是中国进入美好社会主义所不能逾越的必经阶段。除此之外,还有比以上启示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国家和政府的任何行为,在坚持国家利益的基本原则下,不忽视人民利益(农村中不忽视农民利益)也是应该坚持的重要原则之一,或者在某种程度上说,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可以并行,因为国家利益是手段,而人民的利益才是最终的落脚点和归宿。

2 农业供给侧改革的生成逻辑

2.1 农业供给侧改革是市场经济下总需求理论出现缺陷而作出的新调整

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是统购统销,违反了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经济规律,计划经济体制作为中国一种特色资本原始积累方式,其实质是依靠行政力量强行压低消费,实现内部高

积累。1958 年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主要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经济灾难接踵而至,农业大幅减产,人民生活极端困难。后来进行了调整,但是也是为了固化原有计划体制,“文化大革命”更是使中国发展误入歧途,由于长期忽视消费品生产,对于绝大多数的老百姓来说,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甚至停滞,转换经济管理方式成为必然,经过计划和市场理论和实践长期纠葛,1992 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终于在我国确立。在农村废除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把生产经营自主权还给了农民,作为一种制度供给,家庭承包制更多属于需求诱导型,即主要来自农民群众的自发要求。只有把农村微观经济组织从政府的直接控制下解脱出来,由市场代替政府直接引导其生产经营活动,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才有可能得到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一种制度供给,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究其根源仍然是它适应了市场的要求,因为微观经济主体——农户或者劳动者个人是独立的投资主体,其投资利益与风险责任向着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方向转变,当前形势下,经营方式的改变不足以成为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其实更为深入和实质的问题是农村所有制改革,不是改变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而是把农户塑造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财产主体,使农民重建家庭的私有财产,从而激发农民的劳动热情和扩大积累的积极性^[6]。从世界范围来看,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总需求管理政策的缺陷开始暴露,重视发挥市场的作用,实现总供求关系的自动调整,已经成为宏观经济管理分析的重点,其缺陷在于它只是一种需求替代政策,因此短期有效,从长远来看,总需求管理的效率则不容易确定。特别是以财政政策为主导的总需求政策所面临的问题更大,不断增加的政府投资量等于其他方面支出的净减少量,长久下去,财政扩张一定会引起财政赤字,财政赤字的长期化就会造成货币供给不稳定,这点是极其麻烦的。需求侧理论的另一个支点是对国外的依赖,一个是外部供给冲击,即本国经济所必需的外部世界生产要素价格受某种因素影响突然大幅度上升,造成本国经济的不稳定,另一个是需求冲击,它是指外部世界对本国出口产品的需求突然非正常减少。全球经济危机后,对我国出口增长造成了很大冲击,出口市场萎缩时,如果国内政策不调整,供需不均衡,那么经济增长率将继续下降,失业率上升和通货紧缩也将会出现,这样就给供给侧理论提供了空间和平台,相对于需求拉动论来说,供给学派的核心,在于重视市场的主体作用,强调政府为市场主体提供必要的外部条件,政策供给、制度供给、公共产品供给也在供给之列。

2.2 农业供给侧改革对中国农村实际的应然回应

供给侧要素的核心是土地、劳动力、资本,随着经济的深入发展,结构变动、技术创新和制度也成为供给侧的重要组成部分^[7]。如土地问题,提高劳动生产率需要适宜的土地制度与之相适应。现阶段,农村中土地问题和矛盾突出,如土地被征用过程中,高比例的土地用于商业性用途,而农民获得的补偿在土地出让价值中仅占很小比例^[8]。用不同方式侵犯农民的土地合法权益,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纯粹的土地公有制国家的历史经验(如中国)表明,农业生产率不会由于土地公有制的建立而提高。在农业中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仅仅靠土地公有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把农民付出的努力和其劳动成果紧密地结合,而在我国实行的农村集体所有

制下,按劳分配本来是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但是由于农业的特殊性,其计算量达不到精准,因此也就消解了这种机制的实效性。同时,农户财产关系不是很清晰,对农民财产保护的制度和意识也不强烈,都影响农民发展生产的热情和积极性。土地包干到户的小家庭式生产,形成了土地使用的局限性,阻碍了现代农业机械的使用和规模化发展。再如农村劳动力问题,目前,一方面,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大约 1 亿~1.3 亿,大量劳动力滞留在土地上,影响了农业规模化和技术现代化的使用,使得我国农业生产率总处于低水平上。另一方面,近年来,农村的基础教育和素质教育滞后,使得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样的教育状况和素质现状难以适应农业现代化的需要。再如农产品结构问题,玉米在临储制度下价格扭曲,供给、库存严重过剩,而大豆产量偏低,严重依赖进口,供求缺口逐年扩大,2015 年,我国大豆进口超过 8 000 万 t,而国内年产大豆不到 1 200 万 t,不到进口量的六分之一^[9]。农产品供求总体趋向偏紧,部分农产品供求明显失衡,我国农产品低端供给较为充足,而放心安全的农产品供给又明显不足^[10],国际农产品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冲击,粮食安全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政治问题或者国家的重大战略问题,虽然粮食总产连年增长,但是粮食供求平衡的压力仍然巨大。除了上述几个重点论列的问题之外,农业资源环境的浪费和污染问题、农业基础设施薄弱问题、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管理滞后问题等,都迫切需要加快农村供给侧改革,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改善农村面貌,提升农民生活水平,最终实现农业现代化。

3 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体现各色市场不同的要求

3.1 产品供给:绿色

自然资源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它具有稀缺性和区域性,环境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和不断加剧,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出了挑战。因此节约和减少环境污染成为了发展经济,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总的来说,绿色供给主要是指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生产过程中要注意环境的保护。国家非常重视绿色发展问题,2017 年 5 月 26 日中央政治局进行了第四十一次集体学习,强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要要求,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让中华大地天更美、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长期以来,我国的农业经济走的是一条传统的粗放型增长道路,资源和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11],为了追求高回报率,在农业上采取工业化生产,打农药、喷工业或者化学药剂以增加产量,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全球用于对付害虫的农药达 12 000 多种,我国每年生产大农药品种 200 多种,原药生产 40 万 t,位居世界第二位。化肥和农药相当普遍,它已成为我国水环境和大气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之一^[12]。我国农业生产中过量使用化肥和农药使得蔬菜、粮食、水果和一些农副产品中有害成分增多,极大地影响了食品安全,危害着人体的健康。但是农业生产过程是一个生物学过程,工业的方法运用到农业生产中,虽然效益和产量提高了,但是食物的安全性受到了严重破坏,这种破坏性结果短期内不会呈现,但是终究会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回馈”给人类自身。因此,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推进绿色生产势在必行,这种

经济的特点是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在农业内部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环境污染最小化的模式,从之前的强调数量优先到质量优先的转变,它着眼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实现人与自然之间最理想的循环经济系统。为了确保农产品的安全和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我们要增加有机肥施用量,还可以增加秸秆的用量,适当发展畜牧业,扩大绿肥和牧草种植也是增加有机肥的重要措施;研制新型肥料(如控释肥料);较少施用农药,特别是高毒、高残留农药和过量使用农药对人体的危害极大,一定要严格控制,在这方面可以使用生物防治技术研发绿色农药。节约也是产品绿色供给的内涵之一,我国人多地少,人均耕地仅为 0.11 hm²,且仍然在减少,显然耕地紧缺已经成为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中的一个制约因素,大力发展节约土地的农业生产模式刻不容缓。从水资源来看,我国是水资源总量大国,但是人均占有量很低,是世界 13 个贫水国之一,水污染也非常严重。利用技术节约土地和水的利用,同时,政府在对土地资源和水资源实施方面严格监管,比如水资源方面:政府根据用水量和水质来确定水价和供水量,并收取污水处理费,超过额度的重罚,政府制定严格的制度就是鼓励农民节约用水,最终达到节约资源的目的。

西方发达国家为应对环境问题和资源紧缩提出了绿色发展战略,实施绿色新政,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相关经验进行总结并合理借鉴,对于生态困境中的中国来说,意义非同寻常。如美国,它是世界上最早开展绿色保护的国家之一,打破了企业只顾生产,不顾环境保护与资源的陈旧方式,保护环境的同时不断创新生态文明建设方式与技术,并将其用于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美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包括绿色金融、绿色保险、绿色能源等方面,其基本理念是“谁污染谁治理”,银行等金融机构放贷时必须高度关注和评估放贷企业的环境破坏风险,并予以防范,以此金融放贷的形式约束企业生产中的污染行为,已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绿色保险方面,美国在 1982 年成立污染责任保险联合会,共摊保费,为其成员公司提供污染责任保险,政府每年向重大环境风险企业征收 5 亿美元的税款,专款专用,用于清理严重的环境污染,帮助保险人分散巨大的环境污染风险。绿色能源方面,美国加强对能源和环境领域的科研投入,利用科学技术的优势,扩大替代能源的使用,注重投资大学、实验室等研究机构,为绿色技术创新提供知识和技术支持。欧盟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也有自己的特色,欧洲是推行绿色经济的先导者,其环境保护经济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绿色经济发展模式是欧盟实施范围最广的经济模式,它将环境污染治理、环保产业发展、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和节能减排都纳入到生态文明建设的框架中。欧洲的绿色消费也蔚然成风,消费者更喜欢购买有绿色标志的绿色产品,绿色消费需求也成为拉动绿色产业发展的动力。德国也是国际绿色信贷政府的主要发起国之一,其有效性表现为政府以及各种政策性银行能够为环保和节能项目提供低管理成本的贴息贷款等来规范绿色信贷行为,保证各类贷款项目都能通过公开透明的招标方式开展。日本生态文明建设的特色是重视减排,主导建设低碳社会。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就开始了保护环境、减少污染、节约能源的循环经济政策实践,并于 2000 年正式确立了发展循环经济、构建循环社会的目标。日本也重视绿色技术创新,并把成

果和技术运用到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日本的绿色监督也很有亮点,它实行的是自上而下的四级管理模式,上到首相、下到各县的经济产业局,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监督管理链条。

3.2 地区供给:特色

我国地域宽广,气候地形各不相同,如何根据地方优势发展特色经济、增强新农村建设的产业支撑,是各地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面临的头等问题。特色农业发展道路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是促进农业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抓手。如同不同国家采取不同的农业发展模式一样,各类国家不同的农业发展方式是由各国自身的特点决定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国家由于地广人稀,人均土地资源丰富,采取了以机械技术的推广应用为起步的农业现代化模式。日本土地资源不足,因此采取了以生物技术为农业技术创新的重点,提高单产,以增加农产品供给。西欧的资源状况介于日本和美国之间,因此实行“物力投资”和“智力投资”并举,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国家情况不同,采取的发展模式不同,在我国各个地区也是同样的道理。比如北京延庆区,位于北京市西北方向,距离北京市 74 km,山中因中生代燕山造山运动形成了地质遗迹,又经过近代侵蚀,形成沟谷交错的景观,除此之外,延庆区还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历史文化悠久,在南北民族文化的碰撞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文化,根据自己独特优势,延庆区的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为该区发展贡献最大,生态旅游已经成为这个地区最主要的产业特色^[13]。乡村旅游带动了区域发展、经济发展的同时,乡村环境也得到了改善,实现了经济发展和自然和谐的共融共生。再如,位于湖北土家苗族自治州的洞族村高拱桥村,全境属山地,其气候、阳光、雨水、土壤等各个方面的独特自然条件,非常适宜亚热带作物特别是茶叶的生长。这个村从原来的以种植水稻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小村庄,发展到今天走上茶叶富民兴村,其关键的原因就是当地政府审时度势,因地制宜,充分认识到当地的独特优势。农村供给侧改革,要从各地实际出发,找到各地的特色和优势,努力发展自己,才是农业发展的可行途径。

3.3 政策供给(制度供给):本色(体现社会主义共有或公有)

我国现阶段农村的土地所有权主体当然是集体,但是到底谁代表集体行使土地所有权,却不清晰。多元化发包主体的存在,也使农村土地产权关系混乱,影响农户对土地的长期投资。农村地税制度随意性相当大,实际上是对农民利益的损害。不少地方政府低价征收土地,使农民部分丧失土地所有者地位,也丧失土地资本化过程中所应取得的价值效益,鉴于上述问题,要对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进行改革,以激发农民的内在动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土地的性质属于集体,农民有经营权和流转权,还可以从把农户塑造成为相对独立的财产主体^[14]。这个角度来思考,即重建农民或农户的私有财产,享有地产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占有、使用、收益和部分流转权,农户积累的自由财产,自愿组合成的新的多种形式财产关系的财产权利,更深层次地调动农户的积极性,从而为实现共有奠定基础。经营制度改革,家庭联产承包制下,由于农户经营规模过于狭小且分散,生产效率不高,难以抵挡自然和市场的风险,更不能够支撑国家快速发展对农业的要求,规模经营成为一种推动农业发展必要途径之

一,而规模经营的前提就是土地能够正常流转,目前来看,我国农地流转比例不高,主要有农地转包、农地租赁、代耕代种、农地入股等方式,前 3 种只是农民不愿意把土地彻底或者长期流转的暂时方式,反映出了农民对土地流转的担忧和不确定,农地入股是可以施行的长期流转途径,农地流转需要制度支撑,而三权分置是农村土地经营方式的重大创新,是把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和土地经营权分置进行,有利于促进土地经营权在更大范围内的优化配置^[15],让流出土地经营权的承包户增加财产收入,同时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现规模经营,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由于我国农村地域广阔,情况复杂特殊,因此在我国实行规模化经营应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自然条件采取不同的具体方式,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采取土地入股的方式,农民与公司实现劳动合作和以土地为股金的股份合作,真正实现农民增收,农业资本所有者的逐利本性不可能变化,因此还要警惕资本裹挟农民利益、损害农民利益的行为出现和发生。制度供给下农民收入增加了,农村发展了,农业现代化的步伐就越来越近了,全体人民的共有(当前包括占多数比例的农民的共有)才真正体现中国发展的本色——社会主义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EB/OL]. (2017-02-05)[2017-04-10].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2/05/c_1120413568.htm.
- [2] 程连升. 筚路蓝缕——计划经济在中国[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38-44.
- [3] 刘恩云. 粮食危机、统购统销与农业合作化步伐加快[J]. 经济研究导刊,2011(11):49.
- [4] 辛逸,高洁. “以农补工”到“以工补农”——新中国城乡二元体制述论[J]. 中共党史研究,2009(9):18.
- [5] 孙中亲. 从计划到市场——中国经济转型探析[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52.
- [6] 许经勇. 论中国农业改革与发展的“两个飞跃”[J]. 天府新论,1995(2):15.
- [7] 贾晋,申云. 农业供给侧改革——基于微观视角的经济学分析[M]. 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6.
- [8] 王朝华. 城市化过程中失地农民利益受侵害的制度根源分析[J]. 农业经济,2012(8):4.
- [9] 姜超. 谈农业供给侧改革[EB/OL]. (2016-12-30)[2017-03-11]. <http://www.zgxcfx.com/zhubiantuqian/94609.html>.
- [10] 陈荷西. 聚焦“去库存”首提农业供给侧改革[J]. 中国商报,2015-12-30.
- [11] 刘芳. 关于我国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思考[J]. 经济研究导刊,2010(35):68.
- [12] 叶堂林. 农业循环经济:模式与途径[M].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5.
- [13] 李玉新. 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的协同研究[M]. 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16:128-129.
- [14] 周琳琅. 我国农业家庭承包制理论和政策的演进轨迹[J]. 学术论坛,2004(4):62.
- [15] 李军国. 农地“三权分置”助推我省农业现代化[J]. 新长征,2017(1):47.